

资本禀赋、城市环境对流动人口 机会型创业的影响研究

殷江滨^{1,2}, 张倩倩¹, 林赛南^{3,4*}, 黄晓燕^{1,2}, 祁琪¹

(1.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 西安 710119; 2. 陕西师范大学全球区域与城市研究院, 西安 710119;
3.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武汉 430072; 4. 湖北省人居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摘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发生机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论文通过关注个体资本禀赋和城市环境2个层面因素,对比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3类不同范围的流动群体,剖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机会型创业率较低,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率高于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②不同资本禀赋对3类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产生了差异化影响。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随着流动范围的扩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不断增强,经济资本的影响则逐渐减弱;③城市环境解释了10%~20%的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变异,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敏感,尤其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显著影响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此外,个体资本禀赋与城市环境的相互作用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同时存在着负向和正向2种效应。针对不同流动范围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及其差异性的探讨,可为完善城市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流动范围;多层模型;中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作为创业活动的重要群体,城市流动人口往往比城市本地居民具有更高的创业倾向,因而受到广泛的学术关注^[1-2]。与一般就业不同,流动人口创业不仅可以解决其自身的就业问题,提高经济收入,加快融入当地社会^[3],还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城市创新与经济增长,激发社会活力^[4]。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3.76亿人,占总人口的26.6%,比2010年增长了10.1个百分点^[5]。在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研究流动人口的创业特征与驱动机制,不仅有助于构建城

市创业支持体系,促进流动人口的创业参与,还能深化对人口流动的理解,丰富和发展地理学的创业研究理论。

创业活动是微观个体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6],流动人口的创业活动也不例外。已有研究对个体属性与流动人口创业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其中,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禀赋是相关研究关注的焦点。首先,关于人力资本对创业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性认识。部分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高的流动人口具有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也更容易获取银行贷款等创业资源,因此创业概率更大,如冯建喜等^[3]利用江苏省调查数据研究证实,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创业的可能性

收稿日期:2022-01-18;修订日期:2022-07-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13, 42171205)。[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2071213 and 42171205.]

第一作者简介:殷江滨(1985—),男,江西湖口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9620M),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经济地理研究。E-mail: yinjb@snnu.edu.cn

*通信作者简介:林赛南(1987—),女,浙江永嘉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12373M),主要从事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城市地理研究。E-mail: sainan.lin@whu.edu.cn

引用格式:殷江滨, 张倩倩, 林赛南, 等. 资本禀赋、城市环境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0): 1833-1845.
[Yin Jiangbin, Zhang Qianqian, Lin Sainan, et al. Effects of capital endowment and urban context on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10): 1833-1845.] DOI: 10.18306/dlkxjz.2022.10.005

越大。但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更高的人力资本使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得稳定的有薪工作,从而降低其创业的可能性,如魏下海等^[7]利用2013—2014年全国层面数据分析发现,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流动人口创业的概率下降2.1%。其次,经济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以正向作用为主。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多,越能为其创业活动提供支持,以缓解正规金融机构对流动人口的信贷约束,从而促进创业的发生。如Chen等^[8]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数据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显著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创业活动。最后,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的促进作用得到了广泛证实。与同乡、朋友或流入地社区之间的联系,可以增加信任感,解决创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技术经验、客户资源等,从而降低创业的潜在风险,促进企业创建与发展^[9]。如王春超等^[2]基于中国15个迁移目的地城市的农村—城市移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移民社会关系网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其创业概率增加约1.5%。

外在环境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但不同于跨国移民创业研究侧重于族裔飞地、市场监管、创业政策等因素^[10-11],关于国内城乡流动人口创业的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经济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人才资源等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对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力越强,更能使个体感知到创业机会,从而促进创业的发生。但与此同时,经济水平也可能对创业产生负向影响,因为那些经济繁荣的城市可为流动人口提供充足的工资性就业机会,从而抑制创业活动^[8]。劳动力市场状况方面,对于国内乡—城流动人口而言,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其在行业、职业、所有制等劳动力市场中面临多方面进入壁垒,其工资体系、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与本地居民相比也处于劣势地位^[12]。因此,城市内部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越显著,流动人口选择自主创业的可能性越大^[8,13]。此外,城市人力资本、交通区位条件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也受到关注。理论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城市可以保证创业企业的技能型劳动力供应,从而有利于流动人口新创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的创建,但这一观点尚未得到普遍证实。如Fu^[14]利用2014年中国全国层面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城市技能型人才的可获得性并未显著促进流动人口的创业活动。良好的交通区位条件可以使经济主体更容易进入广阔的区域市场,被认为是创业发生的

关键因素^[14],但相应的实证证据较少。

已有关于城市流动人口创业的研究日益深入,成果不断丰富,但还存在一些关键不足有待弥补。首先,已有研究侧重于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角度考察个体层面资本禀赋的作用,从地理学角度对城市环境因素(urban context)的剖析仍显不足^[10,15-16],且倾向于将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单独进行分析,较少关注二者的共同影响^[14],外在环境如何作用于流动人口的创业活动尚缺少足够的研究支撑。其次,将创业活动看作一个整体,未充分考虑其内部差异。一般而言,创业活动可分为机会型创业(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和生存型创业(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17]。其中,机会型创业是个体受创新性商业机会的感知和利益驱动的创业决策。生存型创业则是由于失业或对工作不满而做出的创业决策^[18]。与生存型创业相比,机会型创业具有更好的成长性,并在提供就业水平、促进创新与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更积极的作用^[14,19]。但已有关于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针对性研究尚不多见。第三,对不同流动范围流动人口创业差异的研究相对薄弱。对于国内流动人口而言,流动范围的不同意味着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规模,以及所面临的制度环境等均存在明显差异^[20],这些都会影响到其创业决策。忽略这一差异无疑会限制对城市流动人口创业的深入理解。近年来,中国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跨省迁移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下降趋势,省内迁移步伐则明显加快^[21]。针对不同流动范围的流动人口群体,深入剖析其创业决策及驱动因素的差异,并讨论其背后的政策含义显得尤为必要。

基于此,本文聚焦于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机会型创业行为,并根据流动范围将流动人口分为跨省流动、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3种类型,尝试运用全国层面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和多层Logistic模型方法,探究城市环境、个体资本禀赋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揭示不同流动范围群体创业决策的个体效应、环境效应及跨层交互效应。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数据

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城市市辖区的流动人

口。研究数据包括流动人口个体数据和城市市辖区社会经济数据。其中个体数据来自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该调查由国家卫计委组织实施,以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县(市、区)户口的15周岁以上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以中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未含港澳台数据)2016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方法进行抽样,全国共调查169989个样本。调查涉及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家庭与收支情况、就业情况、流动及居留意愿、健康与公共服务等方面。数据的时效性、代表性和权威性较强,是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创业的理想数据来源。城市市辖区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交通通达性数据来自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以及《中国交通地图册(2017)》,人才数据通过搜集各地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到。

基于研究需要,对个体总样本数据进行筛选处理。首先,剔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州(盟、地区)和县(县级市、旗)等行政单元样本,只保留城市市辖区样本;其次,剔除65岁及以上流动人口样本,只保留15~64岁劳动力样本;第三,对问卷中“五一前是否有工作”进行筛选,只保留有工作的个体样本。最后得到有效样本为103209个,分布于31个省(区、市)的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一步根据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不同,将所有样本分为跨省流动、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3类。据统计,跨省、跨市、跨县流动人口样本分别为49590、35572和18047个,分别占总样本的48.0%、34.5%和17.5%。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多层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个体和城市因素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主要原因有:①流动人口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其创业决定不仅仅是由孤立的个人或家庭做出,而是受到城市环境的深刻影响,是个体资本禀赋与城市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22];②研究使用的数据为嵌套的跨层次结构数据,流动人口的资本禀赋等为个体层面的非集计数据,城市经济与制度环境等数据则在城市层面衡量。如果使用传统的单层Logistic回归方法将个体属性与城市属性置于同一层进行分析,同一城市流动人口个体间自相关性的存在可能导致低效的模型估计。而且,对每个城市单元使用相同的回归系数,意味着城市变量对不同城市中流动人

口个体的影响不存在差异,这与实际的跨层结构不符。多层模型(multilevel model)允许将个体和城市层面的因素整合在一个真正的层次系统中,运用多层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估计,模型结果更为可靠。同时,多层模型还可进行方差及协方差的有效估计,提高模型的简约性。该方法已在创业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23-24]。本文中,第1层为流动人口个体层,第2层为城市层。模型结构为:

个体层:

$$\text{Prob}(Y_{ij}=1)=\Phi_{ij} \quad (1)$$

$$\ln\left[\frac{\Phi_{ij}}{1-\Phi_{ij}}\right]=\eta_{ij} \quad (2)$$

$$\eta_{ij}=\beta_{0j}+\beta_j\times X_{ij}+\gamma_{ij} \quad (3)$$

因此,

$$\eta_{ij}=\ln\left[\frac{\Phi_{ij}}{1-\Phi_{ij}}\right]=\beta_{0j}+\beta_j\times X_{ij}+\gamma_{ij} \quad (4)$$

城市层:

$$\beta_{0j}=\gamma_{00}+\gamma_{01}W_j+\mu_{0j} \quad (5)$$

$$\beta_j=\gamma_{10}+\gamma_{11}W_j+\mu_{1j} \quad (6)$$

总模型:

$$\ln\left[\frac{\Phi_{ij}}{1-\Phi_{ij}}\right]=\left(\gamma_{00}+\gamma_{01}W_j+\gamma_{10}X_{ij}+\gamma_{11}W_jX_{ij}\right)+\left(\mu_{0j}+\mu_{1j}X_{ij}+\gamma_{ij}\right) \quad (7)$$

式中: $Y_{ij}=1$ 表示 j 城市 i 流动人口个体选择创业,其概率 $\text{Prob}(Y_{ij}=1)$ 为 Φ_{ij} , $Y_{ij}=0$ 表示 j 城市 i 个体未选择创业,其概率 $\text{Prob}(Y_{ij}=0)$ 为 $1-\Phi_{ij}$; $\ln\left[\frac{\Phi_{ij}}{1-\Phi_{ij}}\right]$ 为 j 城市 i 个体选择创业与不创业的概率发生比, η_{ij} 为 j 城市 i 个体的创业选择状况; X_{ij} 为个体层影响第 j 个城市第 i 个个体创业选择的变量; W_j 为城市层影响第 j 个城市个体创业选择的变量。个体层随机截距 β_{0j} 和随机斜率 β_j 均被处理为城市层解释变量 W_j 的线性函数。 γ_{00} 、 γ_{01} 、 γ_{10} 、 γ_{11} 为待标定的回归系数, $(\gamma_{00}+\gamma_{01}W_j+\gamma_{10}X_{ij}+\gamma_{11}W_jX_{ij})$ 为模型的固定成分, $(\mu_{0j}+\mu_{1j}X_{ij}+\gamma_{ij})$ 为模型的随机成分。式(3)反映个体属性对机会型创业决策的影响,式(7)反映个体属性及其所在城市因素对机会型创业决策的双层级作用关系。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进行参数求解, μ_{0j} 与 μ_{1j} 均为城市层的随机误差项,可认为符合正态分布,即 $\mu_{1j}\sim 0$ 。

1.3 变量选择

本文的因变量为流动人口的机会型创业决策,

为二分变量。参考已有研究^[25-26],将就业身份为雇主的受访者视为机会型创业者,赋值为1,否则为0。

自变量包括个体层和城市层2大类,其中个体层变量主要涉及流动人口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3类资本禀赋(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状况。社会人口学特征使用年龄、性别进行衡量。人力资本禀赋采用受教育年限进行衡量。收入状况是指代经济资本的重要指标,但考虑到个人收入与经济资本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已有研究^[7-8],采用家庭平均月收入衡量经济资本禀赋。以往研究往往以血缘、业缘以及老乡等较强的社会网络关系来衡量社会资本,本文考虑到行会/商会关系对创业者(特别是机会型创业者)社会资本的重要影响^[27],采用参加家乡商会频率衡量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禀赋。城市层为城市环境变量。考虑到国内城市流动人口创业的自身特性,本文拟从经济环境(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劳动力市场分割、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区位等方面探讨外在环境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效应。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最终确定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人才可获得性和交通通达性4个指标。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人均GDP衡量。劳动力市场分割方面,考虑到工资歧视与不平等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采用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流动人口平均工资的比值指代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28],比值越大,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越严重。人才可获得性通过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比重越

高,即人才可获得性越好。交通通达性是指各类活动运用交通系统达到特定区位的能力,是衡量城市区位条件的常用指标^[29],本文采用基于公路的城市到全国其他城市平均最短时间距离衡量交通通达性水平,时间越短,说明通达性越好。模型估计时,个体经济资本、城市人均GDP均做对数化处理。计算方差膨胀因子进行共线性检验,VIF平均值均不超过1.5,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2 实证结果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

总体而言,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以男性为主,平均年龄35.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10.52 a,以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仅有4%的流动人口参加过家乡商会活动,家庭月收入7543.62元,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2017年人均月工资6193.17元^①)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与跨省流动人口相比,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的男性占比略低、人力资本略多,但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较少。

统计发现,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机会型创业率为5.62%,这一比例介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结果(7.6%)^[9]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结果(3.3%)^[26]之间。跨省流动人口的机会型创业率最高,达6.02%,高于省内跨市流动人口(5.23%)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5.29%)。跨省流动人口中流动到华北和西南地区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1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层次	指标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是否创业	就业身份为雇主=1;否则=0	0.06	0.23
自变量				
个体层	性别	男=1,女=0	0.56	0.50
	年龄	单位:岁	35.50	9.52
	年龄的平方	个体年龄的平方		
	人力资本	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0、小学=6、初中=9、高中/中专=12、专科=15、本科及以上=16	10.52	3.25
	社会资本	2016年以来是否参加过家乡商会,是=1,否=0	0.04	0.19
	经济资本	家庭月收入(元)	7543.62	6021.60
城市层	人均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71826.20	35085.90
	劳动力市场分割	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流动人口平均工资的比值	1.51	0.34
	人才可获得性	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14.00	6.30
	交通通达性	基于各等级公路的城市间平均最短时间距离(min)	420.90	116.20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工资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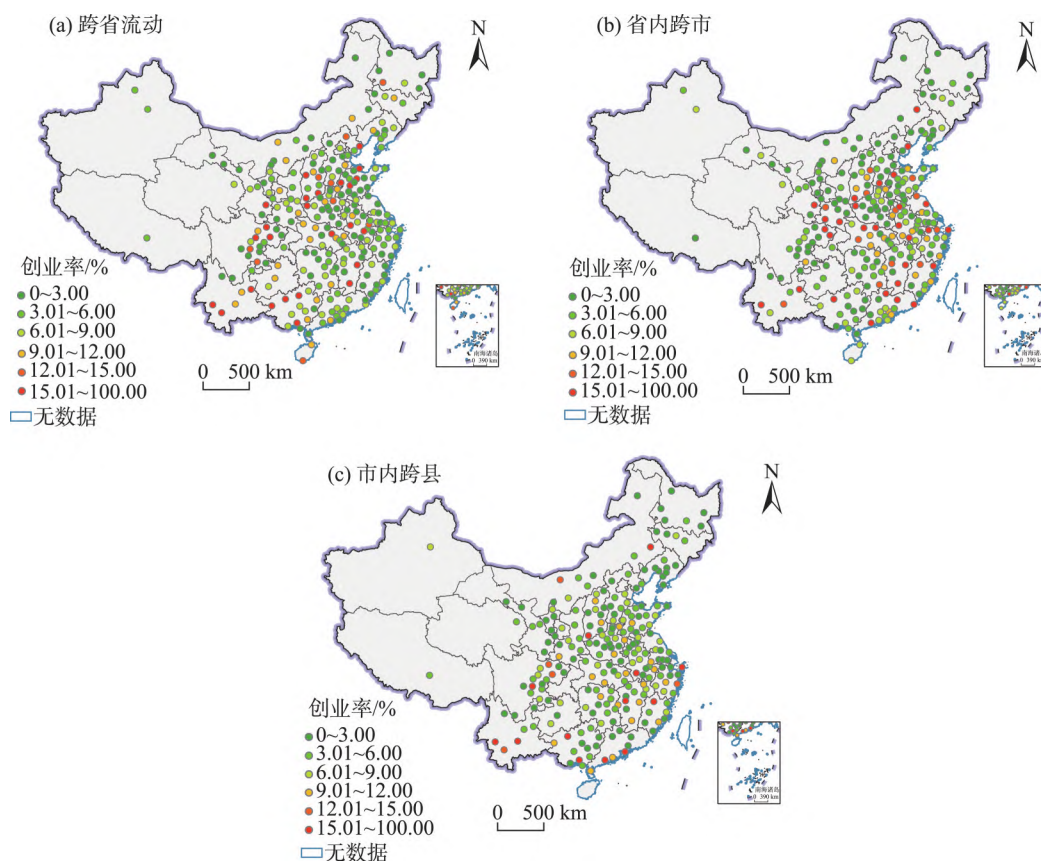
城市的人口机会型创业率相对较高,流动到东部与西北地区城市的人口创业率较低(图1a);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大多数城市创业率较低,可能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就业机会较多、流动人口自主创业的动力不足有关^[30]。省内跨市流动人口中,流动到中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城市的人口创业率较高(图1b),如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此外,四川部分城市的创业率也较高,而西北和东北地区城市机会型创业率普遍较低,可能的原因是,东北与西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市场经济环境较差,不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31]。市内跨县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率在空间上分布相对均衡,未出现明显的高值空间集聚区域(图1c)。总体上,城市流动人口的机会型创业比例不高,东北及西北城市尤为明显。

2.2 随机效应讨论

运用Stata 15.1 软件进行多层二元Logistic 模型估计,具体分为4个步骤:① 构建2层均没有自变量的无条件平均模型(模型1),判断因变量是否存在显

著的层间变异;② 构建包含个体属性的模型2,研究个体资本禀赋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的影响;③ 构建包含个体属性与城市环境变量的模型3,重点探究城市环境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效应;④ 构建包含个体资本禀赋、外在环境及二者交互项的模型4,重点分析外在环境与个体的相互作用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即跨层交互效应。

无条件平均模型也称空模型,不包含任何自变量,可通过方差贡献确定流动人口创业决策在城市内的相关程度,并表征创业决策的城市层变异是否显著。如表2所示,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的误差方差分别为0.687、0.610和0.541,远远大于各自标准误差0.062、0.066和0.062,表明3类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因城市而不同。计算2层次组间相关系数(ICC),跨省流动人口为0.173(即 $\frac{0.687}{0.687+3.290}=0.173$),表明跨省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的变异有17.3%由城市的差异造成,其余82.7%的变异来自于个体人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1 不同流动范围流动人口创业率的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ntrepreneurial rate of migrants in different migration scopes

表2 无条件平均模型(模型1)的方差估计结果

Tab.2 Variance component of variables in the unconditional means model (model 1)

参数	跨省流动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方差	标准误	方差	标准误	方差	标准误
截距	-2.818	0.064	-2.914	0.061	-2.986	0.060
随机效果						
城市之间变异	0.687	0.062	0.610	0.066	0.541	0.062
个体之间变异	3.290		3.290		3.290	
组间相关系数(ICC)	0.173		0.156		0.141	
城市样本量	256		256		236	
个体样本量	49590		35572		18047	

口学特征和资本禀赋状况;省内跨市流动人口的ICC为0.156,即城市层差异导致了15.6%的省内跨市流动人口创业决策变异,其余84.4%来自个体层变量;市内跨县流动人口的ICC最小,为0.141,表明14.1%的创业决策变异可分解到城市层变量,其余85.9%的变异来自于个体层变量。可见,个体层因素是导致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的主要因素,但城市层因素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流动范围较大的流动人口而言更是如此。

2.3 个体效应

将个体层因素纳入多层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流动范围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的影响因素,

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模型2)所示。个体人口学特征方面,性别对3类流动人口均产生了显著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流动人口从事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更大。这与周敏慧等^[32]、朱明宝等^[33]的结论相一致。男性通常比女性具有更强的风险容忍度和承担能力,其独立自主意识更强,机会型创业可视为一种事业追求,男性因家庭分工等原因通常具有更强的时间支配能力,因而从事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更大。年龄与3类流动人口的创业概率均呈倒U型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人口的资源、资本和信息积累的增加有助于创业的发生,但到达一定阶段后,他们更向往相对稳定的生活,其风险偏好程度

表3 创业决策影响因素的多层模型估计结果

Tab.3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for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层次	变量	模型2			模型3		
		跨省流动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跨省流动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个体层	性别	0.294***	0.309***	0.437***	0.297***	0.309***	0.436***
	年龄	0.253***	0.234***	0.207***	0.253***	0.233***	0.207***
	年龄的平方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人力资本	-0.027***	-0.031***	0.003	-0.027***	-0.031***	0.004
	社会资本	0.944***	0.656***	0.526***	0.942***	0.655***	0.527**
	经济资本	1.456***	1.655***	1.680***	1.459***	1.660***	1.692***
城市层	人均GDP				-0.464***	-0.365***	-0.370**
	劳动力市场分割				0.829***	0.151	0.141
	人才可获得性				0.562	0.419	0.204
	交通通达性				-0.002	-0.001	0.020
	常数项	-20.794***	-21.815***	-22.031***	-16.916***	-17.467***	-18.025***
随机效应	城市之间变异	0.783	0.523	0.612	0.702	0.477	0.559
	对数似然值	-9644.1	-6321.5	-3253.1	-9624.9	-6312.9	-3244.5
	Wald chi2	2463.5	1494.0	746.9	2480.7	1512.0	757.3
	Prob > chi2	P < 0.0001	P < 0.0001	P < 0.0001	P < 0.0001	P < 0.0001	P < 0.0001
	个体样本量	49590	35572	18047	49590	35572	18047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下同。

降低,因此创业概率随年龄的增长先上升后下降。这一结果与已有关于城市流动人口创业的研究结论相吻合^[2-3,9]。

城市流动人口的资本禀赋对其机会型创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对跨省和省内跨市流动人口的机会型创业选择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市内跨县流动人口的影响不显著。受教育年限越多,跨省和省内跨市流动人口从事机会型创业的概率更低。这一发现印证了中国流动人口创业者属于Borjas理论中反向选择(negatively selected)的观点^[34],由于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那些低人力资本的流动者选择创业,而高人力资本流动者选择更为稳定的工资性工作^[32]。有意思的是,人力资本对市内跨县流动人口的机会型创业影响并不显著。本文推测这与不同流动范围导致的就业市场进入壁垒差异有关。与跨省和省内跨市流动人口相比,短距离的市内跨县流动人口面临的就业市场歧视相对较少,获得本市就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可能性更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力资本对创业选择的负向影响。

社会资本对3类流动人口的机会型创业决策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参加家乡商会的频率越高,从事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越大。值得指出的是,跨省流动人口受参加商会频率的影响最大,省内跨市流动人口次之,市内跨县流动人口受影响最小。我们认为这与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差异有关。随着流动范围的扩大,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积累的社会关系损失越大,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资本越少^[3,35-36]。家乡商会作为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发现市场机会和提供创业资源的重要组织^[27],对于有意向创业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大范围的跨省流动人口而言,无疑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经济资本的增加显著提高了3类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概率。由于正规金融机构的限制,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面临较大的金融约束和创业资金门槛,家庭储蓄资金不仅构成了创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37],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部融资规模,是影响流动人口创业决策的重要因素。与跨省流动人口相比,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受经济资本的影响更大。这与社会资本的估计结果恰好相反。如前所述,大范围的跨省流动人口受社会资本的影响更大,因为通过参加家乡商会活动,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民间借贷渠道,从而减少对家庭财富的依赖。换言之,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对流动人口

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存在互补关系,小范围流动人口更多受经济资本的影响,而大范围流动人口受社会资本的影响更为明显。马光荣等^[38]关于中国农民创业的研究同样发现了这一规律。

2.4 环境效应

在个体模型基础上,加入城市环境变量构建完整模型,重点探究城市环境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的影响。由表3(模型3)可知,经济发展水平对3类流动人口的机会型创业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经济水平越高,流动人口越不可能开展机会型创业。这与Chen等^[8]关于全国流动人口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但与王春超等^[2]、Fu^[14]的研究结论相反。可能的原因有:一是本文的因变量为机会型创业决策,与生存型创业不同,这一创业在决策前更为谨慎,当城市拥有较为充足的工资性就业机会时,流动人口往往放弃机会型创业活动;二是本文针对跨层数据结构采用了多层Logistic模型方法,不同于传统单层模型将个体属性与城市属性置于同一层进行分析,因此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差异。城市经济水平可视为流动人口创业的一种机会成本^[39],较高经济水平提高了创业的机会成本,创业变得不再有吸引力,从而促使潜在创业者放弃创业。

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显著影响了跨省流动人口的机会型创业,对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影响不显著。劳动力市场分割越严重,跨省流动人口的机会型创业概率越高($P < 0.01$)。城市内部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导致流动人口在职业、岗位、行业等方面面临就业排斥与歧视,其工资水平长期被“低端锁定”,转而从事创业活动,这与Chen等^[8]关于中国城市户籍歧视与流动人口创业的研究结论相吻合。但未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对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的影响,可能与不同流动范围导致的制度环境差异有关。与大范围的跨省流动人口相比,同一省份内的跨市和跨县流动人口面临的制度门槛相对较低,就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更好,所受到的就业歧视也较少^[40],而且较小范围的迁移使流动人口对本地环境更加熟悉,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本地人更为接近,因此受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相对有限^[41]。

城市的人才可获得性和交通通达性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根据区域创业系统理论,技能型劳动力是初创企业特别是知识型初创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要素^[42]。来自国家与地

区创业的研究均证实了人才数量与结构对新企业创建的积极效应^[43-44]。但本文的实证结果并未发现人才可获得性对流动人口创业的显著性作用。本文认为,这与流动人口的机会型创业特点有关。流动人口创建的多为小型加工制造、餐饮、批发零售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企业^[45],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小,因此城市高技能人才的多寡对其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有限。此外,城市到更广大区域的交通条件并不能显著促进流动人口的机会型创业决策——对3类流动人口均是如此。推测可能的原因是,流动人口创建的企业以小微企业为主,集中于生活服务行业,其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范围较小,更大的市场腹地 and 便捷的对外交通并不能提升其创业的可能性。

2.5 跨层交互效应

通过将流动人口的3类资本禀赋与城市环境变量进行交互,进一步分析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其机会型创业行为,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

首先,探究城市环境与个体人力资本禀赋的相互作用。对于跨省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与城市人均GDP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结合表3模型3的主效应结果可知,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个体人力资本对机会型创业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增强。换言之,城市经济越繁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越不可能从事机会型创业。可见经济发达的城市在长期就业市场(而非创业)上对高技能跨省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此外,人力资本与人才可获得性的交互项系数在跨省流动人口模型中显著为负,但在省内跨市流动人口模型中显著为正,结合主效应结果,表明随着城市人才资源的增加,个人人力资本对跨省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消极影响在进一步增强,但对省内跨市流动人口的消极作用不断减弱。即城市人才资源越丰富,文化程度越高的跨省流动人口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越低,而省内跨市人口机会型创业的概率越高。可能的原因是,跨省流动人口由于对流入地城市的就业、市场环境不熟悉,以及公共服务等制度障碍的存在,城市大量高素质人才加剧了市场竞争,促使跨省人口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者放弃机会型创业活动。而省内跨市流动人口对城市环境较为熟悉,面临的制度壁垒较小,丰富的城市人才资源更有助于文化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开展机会型创业。

其次,探究城市环境与个体社会资本禀赋的相

互作用。对于跨省流动人口,社会资本与城市人均GDP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结合主效应结果说明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放大了社会资本对其机会型创业的积极效应。在原有社会网络损失较大的背景下,跨省流动人口通过参加家乡商会、同乡会等活动在流入地重建社会网络从而促进创业,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其重新获得的社会资本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对于省内跨市流动人口,社会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即劳动力市场分割越严重,社会资本对其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说明正规就业市场的进入壁垒越高,流动人口越倾向于利用重建的社会资本从事机会型创业活动。对于市内跨县流动人口,城市人才资源越丰富,社会资本对机会型创业的积极作用越大。说明市内跨县人口更能借助社会网络利用本地人才资源优势开展创业活动。

进一步分析城市环境与经济资本禀赋的互动关系。对于跨省流动人口,经济资本与人才可获得性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城市的人才可获得性削弱了个体经济资本对机会型创业的积极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城市丰富的人才资源对跨省流动人口构成了较大竞争,那些家庭财富较多的流动人口更有可能放弃创业活动。此外,随着城市交通通达性的改善,个体经济资本对跨省人口机会型创业的正向作用不断减弱。可能是因为城市便利的交通环境使得经济资本丰富的流动人口更愿意从事相对稳定的就业活动,而放弃风险较高的机会型创业。对于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得个体经济资本对机会型创业的积极作用降低。换言之,在经济越发达的城市,经济资本更多的流动人口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更低。推测原因是,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人口由于对本地市场与就业环境较为熟悉,在经济繁荣的城市,那些家庭财富较多的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得满意的工资性工作,从事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更低。

3 结论与讨论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发生机制是亟需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从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视角切入,运用多层Logistic模型方法探究了个体资本禀赋、城市环境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对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

表 4 创业决策影响因素的跨层交互效应估计结果

Tab.4 Results of cross-level interaction effects for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变量	跨省流动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人力资本*人均 GDP	-0.060***	0.022	-0.034	0.026	-0.005	0.031
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	-0.018	0.033	0.040	0.037	0.003	0.051
人力资本*人才可获得性	-0.312***	0.115	0.353**	0.139	0.001	0.001
人力资本*交通通达性	0.003	0.003	0.001	0.004	0.003	0.008
社会资本*人均 GDP	0.448**	0.194	0.410	0.299	-0.267	0.389
社会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	0.149	0.302	0.913*	0.472	-1.129	0.695
社会资本*人才可获得性	0.144	1.073	1.437	1.598	1.124*	0.005
社会资本*交通通达性	-0.036	0.032	0.028	0.053	0.105	0.104
经济资本*人均 GDP	0.148	0.110	-0.285**	0.141	-0.034*	0.179
经济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	-0.248	0.167	-0.158	0.218	-0.191	0.265
经济资本*人才可获得性	-1.316**	0.596	0.419	0.788	0.001	0.002
经济资本*交通通达性	-0.040**	0.017	-0.010	0.024	-0.044	0.044
常数项	-18.387***	11.325	-5.134***	1.419	-20.019	17.626
个体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之间变异	0.690	0.065	0.444	0.061	0.559	0.065
对数似然值	-9593.2		-6301.2		-3244.5	
Wald chi2	2518.8		1532.8		757.3	
Prob > chi2	P < 0.0001		P < 0.0001		P < 0.0001	
个体样本量	49590		35572		18047	

县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差异化影响。

实证研究发现,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不同流动范围人口创业的影响存在互补关系。随着流动范围的扩大,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受社会资本的影响逐渐增强,而受经济资本的影响逐渐减弱。对于流动范围较大的跨省和省内跨市人口而言,其机会型创业表现出明显的人力资本负向选择,高人力资本流动者更倾向于进入工资就业市场,而非创业。而小范围的市内跨县流动人口受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

城市外在环境解释了 10%~20%的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变异,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敏感。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显著影响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由于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流动人口难以进入长期就业市场或面临收入与就业歧视,对于来自外省的流动人口而言,这一制度障碍更为明显,因此,从事机会型创业就成为流动人口实现自身潜能和人力资本回报的重要途径。

跨层交互分析表明,个人资本禀赋和城市环境的相互作用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同时存在着负向和正向两种效应。如在经济越繁荣的城市,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跨省人口、家庭财富较多的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人口越不可能创业,但那些社会资本较多的跨省人口越有可能创业。在人才资源越丰富的城市,那些文化程度较高、家庭财富较多的跨省人口越不可能创业,但社会资本较多的市内跨县人口越可能创业。这无疑与不同类型流动人口所拥有的资本禀赋,以及所面临的城市制度与市场环境密不可分。因此,应充分认识到不同流动范围人口创业决策的差异化影响机制。

本文证实了不同范围流动人口在创业决策上的明显差异,认为这与流动范围导致的流动人口个体及其所面临城市环境不同均存在较大关系。首先,流动范围的不同导致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存在差异。流动范围的扩大导致流动人口在家乡所积累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损失较多,这一方面迫使其在流入地寻求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使其更加依赖于新的社会关系来开展创业活动。其次,流动范围的不同导致流动人口面临

不同程度差别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流动范围越大,如跨越省界的流动人口面临的制度壁垒和制度排斥更为严重,从而直接影响了其对各类公共服务资源(如就业保障、培训、教育、住房等)的获取,这无疑会影响流动人口的经济行为决策。但与此同时,流动范围的扩大可以扩展流动者的劳动力市场,突破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限制,使其获取更多经济机会,从而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因此,差异化的外在环境是影响流动人口创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流动人口在保持较大规模的同时,其空间流向日趋多样化。本文研究表明,对于中国这一地域范围大、地区间制度障碍较多、经济差距较大的国家,研究其流动人口创业时,区分不同流动范围十分必要。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本文研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城市的创业支持政策应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的个体差异,有针对性地提供创业支持。如重点关注文化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通过创业技能培训、创业政策指导等方式,鼓励引导其从事自主创业活动。其次,应根据流动范围的差异,对不同范围流动人口采取差别化的支持举措。对于流动范围较大的群体,应注重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规范完善家乡商会等中介组织,可通过定期举办创业论坛等活动,共享市场信息与资源,提高流动人口在迁入城市的社会资本规模和密度。对于流动范围较小的流动人口群体,应根据其创业特点,完善地方金融体系,通过搭建小额融资平台,减少潜在创业者对家庭财富的依赖,放松创业的金融约束。此外,还应改变劳动力市场上针对流动人口的差异化政策,消除就业歧视,促进流动人口在创业领域与就业市场的自由流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Meng X.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reforms in China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2, 26(4): 75-102.
- [2] 王春超,冯大威. 中国乡—城移民创业行为的决定机制: 基于社会关系网的分析视角 [J]. *经济学(季刊)*, 2018, 17(1): 355-382. [Wang Chunchao, Feng Dawei. The determination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for Chinese rural-urban immigran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s.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8, 17(1): 355-382.]
- [3] 冯建喜,汤爽爽,杨振山. 农村人口流动中的“人地关系”与迁入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 [J]. *地理研究*, 2016, 35(1): 148-162. [Feng Jianxi, Tang Shuangshuang, Yang Zhenshan.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 148-162.]
- [4] Glaeser E L, Kerr S P, Kerr W R. Entrepreneurship and urban growth: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with historical mine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5, 97(2): 498-520.
- [5] 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 [EB/OL]. 2021-05-21 [2021-11-18].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6.html, 2021-05-2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Bulletin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No. 7). 2021-05-21 [2021-11-18].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6.html, 2021-05-21.]
- [6] Fossen F M, Martin T.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 over space and time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8, 70: 204-214.
- [7] 魏下海,陈思宇,黎嘉辉. 方言技能与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6): 36-46. [Wei Xiahai, Chen Siyu, Li Jiahui. Floating population's dialect skill and entrepreneurial choice.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6(6): 36-46.]
- [8] Chen J, Hu M Z. City-level Hukou-based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J].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 2021, 27(5): 1095-1118.
- [9] 叶文平,李新春,朱沅. 地区差距、社会嵌入与异地创业: “过江龙”企业家现象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8, 34(1): 139-156. [Ye Wenping, Li Xinchun, Zhu Hang. Entrepreneurship in strange land and embeddedness of social networks. *Management World*, 2018, 34(1): 139-156.]
- [10] Wang Q F, Li W. Entrepreneurship, ethnicity and local contexts: Hispanic entrepreneurs in three U.S. southern metropolitan areas [J]. *GeoJournal*, 2007, 68(2/3): 167-182.
- [11] Dheer R J S. Entrepreneurship by immigrants: A review of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14(3): 555-614.
- [12] 王美艳.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 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5): 36-46, 205. [Wang Meiye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wage gaps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A study of the employment and wages of migrant labore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5(5): 36-46, 205.]

- [13] 宁光杰. 自我雇佣还是成为工资获得者? 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和收入差异 [J]. 管理世界, 2012(7): 54-66. [Ning Guangjie. Self-employment or becoming a wage earner? Employment choice and income differenc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Management World, 2012(7): 54-66.]
- [14] Fu W Y. Spatial mobility and opportunity-driven entrepreneurship: The evidence from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20, 45(5): 1324-1342.
- [15] Wang D W, Cai F, Zhang G Q. Factors influencing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0, 31(3): 123-145.
- [16] 段吕晗, 杜德斌, 黄筱彧. 上海互联网新创企业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3): 383-394. [Duan Lvhan, Du Debin, Huang Xiaoyu.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location of internet start-ups in Shanghai,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3): 383-394.]
- [17] Reynolds P D, Bygrave W D, Autio E, et al.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02 executive report [R]. Kansas City, USA: Ewing Mario Kauffman Foundation, 2002.
- [18] Caliendo M, Kritikos A S. Start-ups by the unemployed: Characteristics, survival and direct employment effects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0, 35(1): 71-92.
- [19] 张萃. 什么使城市更有利于创业? [J]. 经济研究, 2018, 53(4): 151-166. [Zhang Cui. What makes cities more entrepreneurial?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8, 53(4): 151-166.]
- [20] 宁光杰, 李瑞.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工流动范围与市民化差异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4): 37-47, 126-127. [Ning Guangjie, Li Rui. An analysis on differences in citizenship attainment for rural to urban migrants with different migration scope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6(4): 37-47, 126-127.]
- [21] 林李月, 朱宇, 柯文前. 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及政策应对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2): 2054-2067. [Lin Liyue, Zhu Yu, Ke Wenqian. Changes in the form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 China an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sponses at the late-intermediate stage of urbaniza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12): 2054-2067.]
- [22] Dahl M S, Sorenson O. The embedded entrepreneur [J].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2009, 6(3): 172-181.
- [23] Hundt C, Sternberg R. Explaining new firm creation in Europe from a spatial and time perspective: A multilevel analysis based upon data of individuals, regions and countries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6, 95(2): 223-257.
- [24] Mickiewicz T, Hart M, Nyakudya F, et al. Ethnic pluralism, im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J]. Regional Studies, 2019, 53(1): 80-94.
- [25] Djankov S, Qian Y Y, Roland G, et al. Who are China's entrepreneur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2): 348-352.
- [26] 张峰, 黄玖立, 禹航. 体制内关系与创业 [J]. 管理世界, 2017(4): 92-105. [Zhang Feng, Huang Jiuli, Yu Hang.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World, 2017(4): 92-105.]
- [27] 陈爽英, 井润田, 廖开容. 社会资本、公司治理对研发投入强度影响: 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实证 [J]. 科学学研究, 2012, 30(6): 916-922. [Chen Shuangying, Jing Runtian, Liao Kairong. How do social capital, corporate governance effect on private enterprise's R&D investment intensity.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12, 30(6): 916-922.]
- [28] 严善平. 人力资本、制度与工资差别: 对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J]. 管理世界, 2007(6): 4-13, 171. [Yan Shanping. Human capital, systems and differences in wages: A case study on the dual labor-markets in large cities. Management World, 2007(6): 4-13, 171.]
- [29] Morris J M, Dumble P L, Wigan M R. Accessibility indicators for transport planning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General, 1979, 13(2): 91-109.
- [30] 施帆, 张佳, 王琛. 中国城乡居民创业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J]. 地理研究, 2020, 39(8): 1852-1863. [Shi Fan, Zhang Jia, Wang Chen. The spatial differ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residen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8): 1852-1863.]
- [31] 和军. 东北经济结构、体制关键障碍与突破路径 [J]. 当代经济研究, 2019(8): 96-106. [He Ju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key obstacles of system and breakthrough paths in northeastern China.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2019(8): 96-106.]
- [32] 周敏慧, Arcand J, 陶然. 企业家精神代际传递与农村迁移人口的城市创业 [J]. 经济研究, 2017, 52(11): 74-87. [Zhou Minhui, Arcand J, Tao Ra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mong Chinese migrant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7, 52(11): 74-87.]
- [33] 朱明宝, 杨云彦. 大城市有利于农民工创业吗 [J]. 财贸

- 研究, 2018, 29(2): 33-42. [Zhu Mingbao, Yang Yunyan. Do big cities contribute to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 workers?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2018, 29(2): 33-42.]
- [34] Borjas G J. Self- Selection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77(4): 531-533.
- [35] 李志刚, 刘晔. 中国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空间分异 [J]. 地理学报, 2011, 66(6): 785-795. [Li Zhigang, Liu Ye. Beyond spatial segregation: Neo-migrants and their soci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6): 785-795.]
- [36] 林赛南, 梁奇, 李志刚, 等. “家庭式迁移”对中小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 以温州为例 [J]. 地理研究, 2019, 38(7): 1640-1650. [Lin Sainan, Liang Qi, Li Zhigang, et al. Family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China's medium- sized city: A case study of Wen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7): 1640-1650.]
- [37] 苏群, 赵霞, 陈杰. 社会资本、非正规金融与农民工自我雇佣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3(6): 85-95. [Su Qun, Zhao Xia, Chen Jie. Social capital, non-formal financial and the migrant workers' self-employ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 33(6): 85-95.]
- [38] 马光荣, 杨恩艳.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 [J]. 经济研究, 2011, 46(3): 83-94. [Ma Guangrong, Yang Enyan. Social networks, informal fin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1, 46(3): 83-94.]
- [39] McMullen J S, Bagby D R, Palich L E. Economic freedom and the motivation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ial action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8, 32(5): 875-895.
- [40] 张吉鹏, 黄金, 王军辉, 等. 城市落户门槛与劳动力回流 [J]. 经济研究, 2020, 55(7): 175-190. [Zhang Jipeng, Huang Jin, Wang Junhui, et al. Return migration and the Hukou registration reform in Chinese citie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0, 55(7): 175-190.]
- [41] 章莉, 李实, Darity Jr. W A, 等. 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机 会的户籍歧视及其变化趋势 [J]. 财经研究, 2016, 42(1): 4-16. [Zhang Li, Li Shi, Darity J W A, et al. The discrimination in job obtainment by Hukou in labor market in China and its change trend.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6, 42(1): 4-16.]
- [42] 符文颖, 董诗涵. 技术型新创企业的地理学研究进展 [J]. 地理科学, 2019, 39(9): 1398-1406. [Fu Wenying, Dong Shihan. Research progress in geography on technology- based start- up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9): 1398-1406.]
- [43] 买忆媛, 梅琳, 周嵩安. 规制成本和资源禀赋对地区居民创业意愿的影响 [J]. 管理科学, 2009, 22(4): 64-73. [Mai Yiyuan, Mei Lin, Zhou Songan. Regulatory costs, resource endowment and local people entrepreneurial propens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09, 22(4): 64-73.]
- [44] Ghani E, Kerr W R, O'Connell S. Spatial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India [J]. Regional Studies, 2014, 48(6): 1071-1089.
- [45] 朱明宝, 杨云彦. 近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 [J]. 人口研究, 2017, 41(5): 89-100. [Zhu Mingbao, Yang Yunyan. Recent trends in employment structure for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2017, 41(5): 89-100.]

Effects of capital endowment and urban context on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YIN Jiangbin^{1,2}, ZHANG Qianqian¹, LIN Sainan^{3,4*}, HUANG Xiaoyan^{1,2}, QI Qi¹

(1. Northwest Land and Resource Research Center,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Global Regional and Urban Research Institut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3.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4. Hubei Habitat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r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migrant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focusing on individual capital endowment and urban contextual factor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mechanisms of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by using data from the 2017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and dual-level logistic modeling, and comparing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migration scopes—interprovincial, interprefecture/intercity, and intercoun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level of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s was low, whereas the entrepreneurial rate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nts was higher than interprefecture/intercity and intercounty migrants. 2) Different capital endowment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three types of migrants. A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was observ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migration scop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migrant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was increasing, whil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apital was gradually weakening. 3) Urban context explains 10%–20% of the variation of the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of migrants. The larger the scope of migration, the more sensitive the migrants were to the change of external context. In particular, the segmentation of labor marke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of the interprovincial migrants. In addi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capital endowment and urban context had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its difference among migrants in different migration scopes,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urban entrepreneurship support system.

Keywords: migrants;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migration scopes; multilevel model; China